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洪业

——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 译
刘东 主编

王朝之更替与循环,构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之突出现象与奇观,本书独具慧眼,选择了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论述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的复杂线索与因果之中,深入剖析、揭示帝国秩序之崩解与重建的过程,并作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论断……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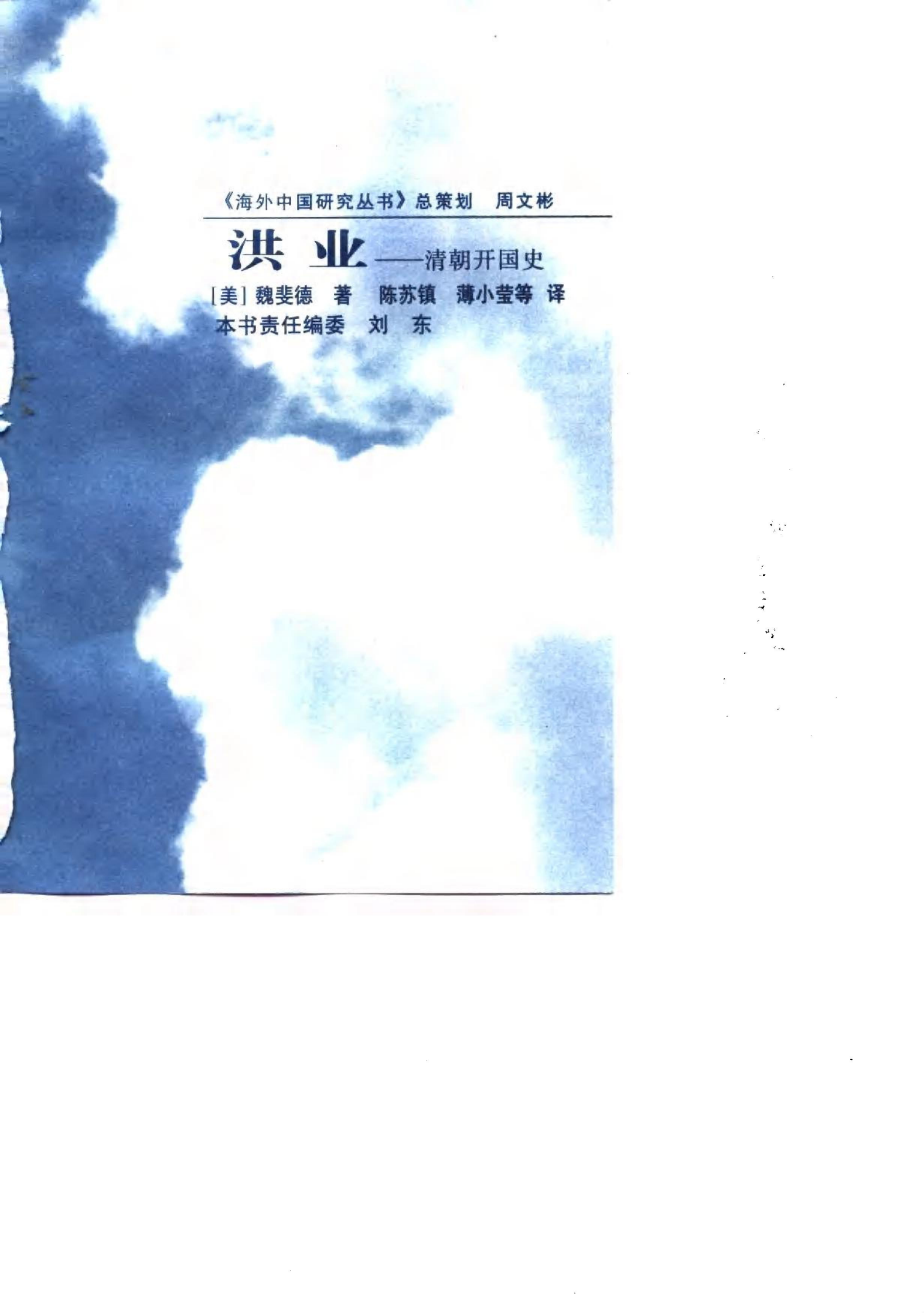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书 名 洪业——清朝开国史
编 著 者 〔美〕魏斐德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地址: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8.75 插页 2
印 数 4041—5040 册
字 数 864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923—4/K·95
定 价 3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策划 周文彬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 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 译

本书责任编辑 刘 东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9/11/09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北部边防 18

明朝的卫所制度 20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26 努尔
哈赤的崛起 35 吞并辽东 41 满汉种族冲突 46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52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58

第二章 崇祯朝廷 62

士大夫的社团 66 科举生涯 81 温体仁当政 88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96 周延儒的荣与衰 103

第三章 满族势力的扩张 111

汉族合作者 113 大凌河之围 120 祖大寿降金与复
叛 127 边民与海盗 138 皇太极称帝 145 攻
克松山 150 洪承畴之降 155 锦州的陷落 158

第四章 北京的陷落	161
李自成起兵问鼎	163
南迁之议	174
崇祯皇帝的末日	187
大顺的臣民	193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205
吴三桂	212
多尔袞决心介入	220
大举南下	225

第五章 南京政权	232
史可法与军阀	234
明朝的皇室贵族	241
皇位继承危机	241
四镇	253
党争复起	260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269
顺案	278
政治迫害	284
南京政府的困境	288
扬州的忠臣	293
和谈	298

第六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	305
地方合作者	306
山东的投降	315
北人与南人	323
清除明代弊政	332
部分的改良	337
满人的弊政	345
旗地与奴隶	348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354
保卫京城	358
抵抗活动的再起	365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373

第七章 南京的陷落	379
勤王选择	381
献身与妥协	384
满人渡河	387
童妃案	390
伪太子	394
左良玉兵变	401
进攻扬州	408
史可法与多尔袞	411
扬州十日屠	416
史可法功过评价	423
弘光帝出逃	427
南京的投降	434
大赦	438
改换门庭	440

第八章 江南的抵抗运动	446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451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456
社会依附关系	465
阶级矛盾	473
农奴暴动	480
合作恢复秩序	485
剃发令	490
地方抵抗运动	

493 嘉定的崩溃 497 太湖义军 502 第一次松江起义 506 遁世隐居 513

第九章 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518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520 山地的“带发”人 527
山东的清剿 532 地方官与胥吏 535 保甲制 539
有区别的恩赦 542

第十章 “危时计拙” 546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547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550
溧阳、淮阳起义 555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559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567 兜捕文人学士 571 淮安之
谋 574 清廷的猜疑 579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584 万寿祺和顾炎武 589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598

榆园军 599 刘泽清案件 605 1648年的回民起义
607 姜瓖之乱 615 征服西部 627 陕西东南与
汉水高地 633 山西山匪 638 总督、缙绅和乡长
644

第十二章 多尔袞摄政 648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650 多尔袞专权 654 南北
之争 660 弹劾冯铨事件 663 满汉两头政治 665
指控亲王 672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676 多尔袞的威
福及其薨殁 682

第十三章 顺治朝 684

皇帝亲政 686 吏治改革 690 清洗都察院 701
抑制贵族 704 了结旧账 707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
的努力 710 皇帝与殉难者 715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719 考课与朋党 721 任珍案 727 仿效明初之制 732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739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745

第十四章 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748

南明海军的威胁 749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754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761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768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775 郑成功的进袭 779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785 赋税制度改革 791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797

第十五章 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803

最后的明朝忠臣 805 公德与良知 815 三藩之乱 821 范承谟的殉难 826 清朝的忠君思想 834

附录 844

A 出仕两朝的大臣 844 B 1644 年的“贰臣” 853 C 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855

中文、日文引书目 857

西文引书目 878

译者后记 912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

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 2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①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③。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
- 3 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①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 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 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

^②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

^③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

中国。^①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 15 万到 18.7 万公斤白银,在 17 世纪的前 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 25 万至 26.5 万公斤。^②

1620 年至 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 4 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③中国尽管与欧

①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 1/3 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 269 页。在 16 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 1550—1680 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 20 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499—500 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 96 页。

②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 1—10 页;米歇尔·德韦兹:《18 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 8—9 页;S. A. M. 阿谢德:《17 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 275 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 124—125 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 1:4;欧洲则是 1:12。到 1650 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 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 459 及 499 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 1560—1600 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 3.3 万到 4.8 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 31 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 4000 到 5000 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68—681 页。

③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55 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 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 20 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 1555 到 1570 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 至 1590 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 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 至 1620 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 至 1644 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 1645 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 579 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①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②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③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

①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 N. 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

②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

③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①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②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 E. 里奇，C. H. 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

①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

②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

衰落^①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②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经过这8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④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①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

②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¹⁴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 H. 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

③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

④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①。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⁹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③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④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

①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歇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

②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

③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

④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